

ZhongGuo Jindai Tiyu Bianqian De WenhuaJiedu

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

文化解读

罗时铭／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体育文丛·体育文化系列

中国近代体育变迁 的文化解读

罗时铭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力 歌
责任编辑 张 力
审稿编辑 鲁 牧
责任校对 罗乔欣
责任印制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罗时铭著. -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81100 - 710 - 7

I. 中… II. 罗… III. 体育运动史 - 中国
IV. G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005 号

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 罗时铭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邮 编 100084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市昌平阳坊精工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定 价 33.00 元(平) 53.00 元(精)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罗时铭，男，1953年生，江苏东台人，史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兼任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体育史、奥林匹克运动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两渡扶桑，先后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和横浜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共出版专著4部，主编和参编教材6部，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设计： 设计工作室

13701038154

封面题字：贾冠华

序

王家宏

“体育”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伊始，中国体育的发展已经从学习、借鉴、效仿西方体育的内容、模式等方面中走出，正在全面走进一个非常兴盛和繁荣的时代，走进一个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具有典型特色的中国体育发展模式。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不仅体现我们在世界竞技体育领域所拥有的强大话语权方面，体现在现时下的中国群众体育的如火如荼的进程中，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文化无处不在地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内容中。国民对体育竞赛的关注程度，对健身体育、娱乐体育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经济富足后的重要关注和参与的文化领域。

今天的体育，已经无处不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从关注体育到参与体育、享受体育，我们在体育的欣赏中获得一种消遣，在体育的参与中获得一种娱乐，在体育的实践中获得一种人生的体验。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权的成功获得，以及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的围绕“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所进行的奥运会筹备工作，也正在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体育的价值也在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高扬着奥林匹克精神，实现着对世界和平主题的不懈追求，成为社会进步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当今，是体育发展的最佳时期。因为，体育的生活化、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的产业化等现实正在改写着人们长期以来对体育的狭隘认识，不断地放大着体育的价值和功能，张扬着体育的文化魅力。但是，在体育繁荣发展的进程中，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正在捆绑着我们，正在影响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李慧斌、薛晓源在其主编的《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前沿报告》中指出的“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现实问题、政策期许、学术批判、理论预设等等层出不穷……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是这个时代理论工作者的幸

运，也是他们的责任”那样，体育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面对体育改革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迎合着体育科学化的快速发展，近30年来体育的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体育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体育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竞技体育的科学化训练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大众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学科的基础理论性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等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获得成功的最佳保障。现今的体育科学研究正呈现出越来越精细化的趋向，呈现出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性特征，呈现出“大型化”综合性的研究特征等等。这些现状和特征是体育发展的需要，是学科成熟的表现。近年来，“体育学”课题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类课题中数量的不断增加，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都充分说明了科学地发展体育和体育发展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控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作为一个热爱体育事业的团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全体教师和研究人员，长期以来秉承着东吴学人的传统，吮吮着姑苏大地的灵性，和全国广大的体育科研同仁一起关注体育事业的发展，关注体育领域的研究动态，并在严谨务实的科学理念指导下，积极参与体育的科学研究。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和支持下，在各位作者不懈的努力下，我们将近年来我院教师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体育总局、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我院教师的博士论文等研究成果，归划在《体育精品研究系列》中；将我院教师的体育文化研究成果归划在《体育文化研究系列》中，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奉献给大家。一方面，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给体育科学研究的百花园增添些许绿叶，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对我们的研究给予关注和指正。

今天，当这两套凝聚着大家智慧、意志和艰辛的丛书将要出版面世之际，我衷心感谢所有为这两套丛书付出心血的朋友们。特别是感谢和我们一起参与课题研究的所有专家学者，因为你们的参与才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加厚重和具有价值。

学无止境，科学研究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旅途。这里只是开始，我们的团队将以此为起点，倍加努力。

目 录

- 1 从洋务救亡到维新图存
——近代中国早期社会思潮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1)
- 2 从西洋体操到西方体育
——近代中国人体育观念的变迁 (29)
- 3 从生物体育到文化体育
——当代中国人体育认知的变化 (45)
- 4 从小脚女人到不让须眉
——近代中国妇女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54)
- 5 从放眼欧美到接受东洋
——中国留学生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 (70)
- 6 从外因动力到内因作用
——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 (95)
- 7 从文化抗争到文化融合
——论近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与奥运文化之间的关系 (107)
- 8 从政治渴望到文化参与
——中国人的奥运文化百年求解 (119)
- 9 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学校
——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现代体育传播发展道路 (129)
- 10 从体验与感悟到思维与理论
——论中国传统养生体育的科学基础 (143)

1 从洋务救亡到维新图存

——近代中国早期社会思潮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所谓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某一社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以及要求的思想倾向，是带有趋势性的思想潮流，是一种群体意识。即如梁启超所说：“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至于衰息。”又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①由此可见，思潮起码包括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不是所有的思想主张都能成为潮流，成为潮流者必然确有价值，且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第二，由思想变成思潮，其发展的动力源当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环境之变迁；二是主观的心理之感召。第三，所谓思潮必然有相当大的规模与气势，而不是某一思想主张的孤立存在。第四，每一思潮都会经历从兴起到发展，到高涨，到低落的演变过程。^②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我们理解到：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过程，乃是由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其高低起伏的不同。因此，讨论晚清社会思潮的变迁及其对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思潮是怎样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体育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早期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趋势。

晚清时期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学东渐，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转型，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清廷在国际关系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全集，专集之34

② 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9

中的不利处境，他们深怀忧国之情，想方设法了解世界形势，以图从中寻找出防范和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因此，救亡图存、求富自强便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强音。正是在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旗帜下，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推动着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

一、洋务思潮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逐步尖锐起来，迫使人们去理智地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已经开始，西学经过欧美传教士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追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思想元素。同时，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愤为雄的举动，亦激励着那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力主兴办洋务的开明官僚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倡言于上，进步的务实知识分子冯桂芬、容闳、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纵论于下。中央当权者和地方实力派的相互配合，上层官僚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的遥相呼应，遂使“洋务”成了“一时之世风，一时舆论之趋向”。^①于是，一场近代史上为时30年的“洋务运动”从此被搞得如火如荼。

1. 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绎而来的。在汉字中，夷和洋的字义本不相干。夷指东夷，指未开化地区。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其用意乃是相对于华、夏部落而言的。但是由于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

^①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741

和历代相互征战，华夏被视为文明礼仪之邦和天下的中心，而蛮、狄、夷、戎则被视作化外之区。因而，“夷”字带有一定的贬义。洋，则是指比海更大的水域。到了近代以后，夷的字义有所延伸，亦指国外或外国的。洋亦有国外或外国之意。所以二字开始相通。但最早对西方各国的称谓，还是借用了古代的“夷”义，所以在鸦片战争前后公私文牒中，常出现英夷、法夷、米夷，以及夷商、夷语、夷船等一类的字眼，并把与西方国家有关的一些事务，称为“夷务”，所以清朝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被编辑成《筹办夷务始末》。此时的夷字，也许仍保持着一定的贬义成分，并为外国学者所了解。所以从1858年6月的《中英天津条约》开始，外国人已明确要求中国，“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①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这一要求再一次被重申。从此以后，在我国的各种文献中，“夷”和“夷务”渐被“洋”或“洋务”的字词所替代。

这种改变，既表现为一方面是屈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也是由于中国人对国际事务认识水平的提高所致。例如：太平天国运动的著名领袖洪仁玕，在他的《资政新编》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对外国际关系中，“凡于生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②一个农民领袖对国际事务都能具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觉醒的程度。所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仅“洋务论”渐占社会文化的主流，且洋务的内涵也日渐扩大。例如：1861年，清政府已成立有专办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外交事务外，人们还把采用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也都称之为“洋务”。所以20世纪初人们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社会的洋务思潮：“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言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曰必达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三联书店，1957. 102

② 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 528

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①

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思潮，在时间段上虽然大都认为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亦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但事实上这种思潮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林则徐、魏源等人身上。例如：林则徐提出要“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有地主阶级的封建士大夫郭嵩焘和冯桂芬，有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洪仁玕，还有呼吁留学教育的活动家容闳，他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环境，也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但他们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以救亡图存。例如：郭嵩焘在1859年曾上书咸丰皇帝，建议在天津设局，如法仿造西洋战舰，同时推求通悉外国语言之人才入京传习外国语言。同样在1859年，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更是提出了一个以仿效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农民施政纲领——《资政新编》，主张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兴办新式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要开设银行、创办邮政，鼓励私人投资，实行保险和专利，以及澄清吏治、革除陋习等等；还主张与各国平等交往、和平竞争。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稍晚一点的冯桂芬，则在1861年发表了他倡导变革的重要著作——《校邠庐抗议》，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定要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弊政，以求富强。

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容闳。容闳（1828～1912），名光照，字纯甫，广东珠海人。容闳7岁时即在澳门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西塾中接受西方的启蒙教育。13岁时，又进入著名的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名字命名的马礼逊学校学习。19岁时，容闳得到香港商人资助，随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布朗到美国留学。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SA）学校修业三年，然后考入耶鲁大学，靠美国一家妇女会的资助和自己的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1854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并获得美国名校学位的中国人。不平凡的求学经历，使容闳非常崇尚西方文

^①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741

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庞大的计划，即回国之后组织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像他那样留学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然后回国效力，以改变中国。他说：“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①为此，容闳在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凭之后，拒绝了当地一些部门的高薪聘请，毅然扬帆归国，以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首选便是于1860年访问太平天国，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举动。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项改革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战备，组织良好军队的问题；创立学校，培养各种人才的问题；聘请行政顾问，建设善良政府的问题；设置银行，厘定度量衡标准的问题等等。容闳明确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政府同意实行他的这些建议，他“愿为马前走卒”，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放弃了太平天国，而转向投靠曾国藩等洋务派，并最终借助他们的力量，初步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于1872年由清政府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学童。

由上引发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导致洋务思潮兴起的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史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洋务思潮的兴起，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不可否认，这样的推论是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的。如在奕訢1861年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从而提出要以“灭发捻为先”。^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发生的时候，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要靖内患，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面，同样也是要御外侮的。例如：奕訢曾表示过，与英法等国议和签约，其目的仅筹办夷务始末，仅是为了“保全大局”，因为英法虽然“渐见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但我们必须要为国家“谋久安之策”，由此“防患正不可不深”。^③因而奕訢明确主张：“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88

② 发捻交乘，指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9卷.291

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①可见，即使像恭亲王奕訢这样的统治者，他们在办洋务时也没有忘记“御外侮”的历史任务。更不要说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开明洋务领袖。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洋务思潮的兴起简单归结为，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以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维护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为什么当时会在学习西方、主张洋务的问题上能够走在一起，并最终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思潮，是不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还是清朝政府，他们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的那些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受到，只有揭露时弊，倡导改革，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既表现在清朝政府方面，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缔结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使清朝政府惊醒过来，他们以为签订了所谓的“万年和约”，就可以从此天下无事，因而依然不思振作，文恬武嬉。虽然早就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但并没有在统治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在士大夫中引起普遍的共鸣。而具有讽刺性的则是日本人十分看重《海国图志》，如获至宝，并最终在励精图治的道路上走到了中国的前头。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暴露无遗，再加之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咸丰皇帝的仓皇出逃，使众多的爱国人士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们反复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因而不得不重新高举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旗，以寻求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

同样的问题在太平天国方面也有表现。1858年的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以后，这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在继续给予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开始出现逆转，暴露出农民政权伤痕累累、江河日下的处境和趋势。而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重要领袖的农民政治家洪仁玕，正是在这一年来到了天京，他充分地看到了太平天国政权“到处尽成荆棘，无处不是陷坑”的危机四伏，因而于1859年向洪秀全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改革内政外交，以“因时制宜，度势行法”，挽救太平天国运动于危难之中的宏大计划。^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2

② 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6

第二，西学的早期传播，为主张洋务的士人们寻求救国真理不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准备了可资借鉴的现成模式。士人们在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共识：中国有很多方面确实是“不如人家”。例如：从国家的总体方面看，表现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在具体的内容上，则表现为如算学、光学、化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上，西方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以及义务教育活动等“多中人所不及”。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西人、西学和西方文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提出了效法西方、推进洋务的主张。

第三，国际社会的改革大潮和成果，给中国人以重要的启示和影响。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取得统治地位并成功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扩张，它要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之中。在这个世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落后的国家或民族要么继续保守走向灭亡，要么主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使自己也变成资产者，所以美国发生了废奴运动，俄国出现了奴隶制改革，日本则酝酿着民治维新。所有这些发生在国际社会的改革潮流，特别是作为近邻的俄国、日本所发生的一切，无不为思想先进的中国人所注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思潮。如《资政新编》中自云“熟谙各国风教”，在大肆赞扬英美国“邦法宏深”的同时，特别对俄、日学习西方事迹推崇备至。俄罗斯邦，曾“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又有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为法则，交来亦必出于巧焉”。^①又有冯桂芬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务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②王韬也曾指出：“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人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③李鸿章在

① 龚书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5.1818

②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74

③ 王韬：《变法自强下》，《弢园外录外编》.58

看到日本国的改革使其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时，亦于1864年春致函奕訢：“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必轍，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① 从而认为，中国也应在国际社会的改革潮流中，在邻近国家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中，注意汲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以从中找出自己的发展方向。

2. 洋务思潮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理论

(1) 中国社会发展机遇理论

所谓机遇理论，就是在思想认识上提出：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能够认识时代变局，把握住历史的机遇。首先提出时代变局一说的是黄钧宰。1844年他在《金壶七墨》一书中说：“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賸，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 后来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郑观应更是将此种西方各国来中华“叩关互市，人居内地”的形式，明确称之为“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未之有也”。^③ 薛福成亦于1864年在其《上曾侯相书》的文章中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并将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④ 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王韬首先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最先提出了要把握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他在1864年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羁縻之，概与之能和立约。”认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⑤ 王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李鸿章的高度认同，他在《复朱久香学使》的信中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10

② 鸦片战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 623

③ 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5

④ 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2，556

⑤ 洋务运动，47

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①因此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向皇帝明确进言道：“历代备兵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李鸿章提出：只要我们自己能同心协力，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②由此看出，洋务思潮不仅引导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时局问题，而且还从社会现实中指出了中国应走的发展道路。

（2）中国社会发展自强理论

所谓自强理论，就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要学习西方和师夷长技的问题。在这里，当然首先碰到的是观念上的解放，即是否承认中国的落后，从而解决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因为华夏中心论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在一些守旧的官僚阶层和落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仍不乏有一定的市场。那些夜郎自大的顽固守旧势力，仍然对发展着的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他们陶醉于过去辉煌历史的回顾之中，甚至于还在为大清皇朝高唱赞歌。以为“我朝定二百余年，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深仁厚泽，普被垓埏。渊乎铄哉！法度纪纲，烂然大备，岂特远过宋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已”！从而认为“中国何弱之有”？既然不弱，那么，只要能坚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则外患胥平，内忧悉泯，亿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③所以他们反对学习西方，反对师夷长技。认为中国三千年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能混一区宇，奠定黎庶。认为鼓吹洋务者乃是“几几乎欲用夷变夏”。^④这些论调理所当然遭到了主张洋务者的批判。例如：冯桂芬就认为：在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均属奇技而非淫巧。因此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他说，中国多秀民，聪明智巧并不亚于外国人，甚至

① 李文忠公全书·明僚函稿，第6卷·2519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5卷·828，1133

③ 方浚颐·议覆赫威两使臣论说·洋务运动（一）·455

④ 洋务运动（一）·455